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57届大会

论文选译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五十七届大会论文选译

G25-53/1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第 57 届大会论文选译

主 编 丘东江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 57 届大会论文选译/丘东江主
编.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ISBN 7-5013-1261-3

I. 国… I. 丘… II.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会
议, 第 57 届—文集 IV.G25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9804 号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第 57 届大会论文选译**

丘东江 主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北京兰空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6 开本 13.5 印张 328 千字

1996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6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册

ISBN 7 - 5013 - 1261 - 3

G · 338 定价: 19.20 元

前 言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 57 届大会于 1991 年 8 月 18 日—24 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图书馆与文化——它们之间的关系。”

今天，人们认识到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可低估。民族的统一和分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无不反映出文化的影响作用。而“图书馆保存着从古至今永恒结构的文化，它保证着人类思想的延续和历史经验的积累。”因此，选择“图书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为本次大会的主题，意在探讨图书馆在世界各国文化发展和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这一论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 57 届大会论文选译》收入大会论文 40 篇，内容涉及国际图联一些部、组的工作情况，少数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图书馆工作理论与实践、技术方法、人员培训以及建筑规划等方面。其中，有些论述对我国图书馆界进行理论研究和从事实际工作会起到启发和借鉴作用。

我们编译出版本论文集的目的在于帮助我国图书馆界了解世界图书馆界的最新发展动态，从而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参加本书编译工作的专家、学者来自不同的单位，他们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一九九四年四月

目 录

1991 年国际图联理事会及大会主席致辞	(1)
图书馆与文化	(5)
国家图书馆的战略计划	(8)
国家图书馆战略计划的制定	(12)
存贮世界信息: 21 世纪的危机	(16)
研究人员对视听资料的需求	(18)
苏联大学图书馆	(23)
语言障碍与机器翻译	(26)
全苏医学情报中心计算机技术和苏联医学数据库	(29)
艺术信息图象技术的发展	(35)
扫除文盲与公共图书馆社会功能的发展	(37)
用标准化的手段共享信息	(43)
国际标准的形成: 对国际标准化组织与国际图联关系的考察	(49)
图书馆为聋人服务的指导方针: 由来及阐述	(56)
苏联图书馆为盲人的服务	(60)
为苏联多民族的人民提供图书馆服务	(64)
藏书和服务部公开讨论会——采访与交换组的报告	(68)
编目组的报告——1990/1991 年工作评述	(71)
分类及主题标引组的报告	(74)
以图书馆书目分类法为基础并附主题款目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主题检索	(76)
联机目录中特种资料的标引与检索	(80)
今天的国家书目, 明天的国家存储器: 问题与建议	(84)
中国图书馆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	(88)
尼日利亚图书馆的采访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92)
民族的特征和知识的世界性: 图书馆的桥梁作用	(96)
英国各图书馆收藏的斯拉夫珍本图书和手稿: 历史和本源	(101)
电子文献传输与图书馆: 技术、策略和问题	(107)
实用馆舍建筑规划的原则	(115)
图书馆事业的地位、形象与声望: 一份经验研究报告	(119)
亚太地区的兴起及其对图书馆员教育和培训的影响	(129)
图书馆的抽象研究: 问题、方法、目标 (列宁国家图书馆经验)	(134)
美国 20 世纪的阅读和阅读调研	(137)
台湾院校图书馆读者教育	(141)
大众图书馆: 非洲的前景	(146)
国际图联核心项目——出版物资源共享 (UAP) 的中期计划 (1992—1997)	(151)
世界数据流和远程通信 (UDT) 核心项目中期计划 (1992—1997)	(154)

世界书目控制与国际机读目录 (UBCIM) 核心项目中期计划 (1992—1997)	(157)
国际图联核心项目——发展第三世界图书馆事业 (ALP) 中期计划 (1992—1997)	
.....	(161)
试论中国大学图书馆的标准化管理.....	(165)
国际图联的长期政策.....	(169)
第 57 届国际图联大会教育与培训组活动侧记	(174)
附录：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177)

1991 年国际图联理事会及大会 主席致辞

国际图联主席 汉斯·彼得·盖

我非常高兴地向来莫斯科参加 IFLA 第 57 届大会的各位代表致以最热烈的欢迎。

此时此刻，我的思绪回到了第 36 届 IFLA 大会。那次大会是 1970 年在莫斯科开幕，在列宁格勒圆满结束。

那次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我记忆犹新。尤其当时的 IFLA 副主席马格丽塔·鲁道米诺 (Margarita Rudomino) 夫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她是一所知名的外国文学图书馆的馆长，这个馆现在以她的名字命名。我认识鲁道米诺夫人是在 1966 年，那时她正在为 1968 年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 IFLA 大会做筹备工作。在 1970 年莫斯科会议期间她对我尤为关心，这份友谊一直持续到她去年逝世。在我多次访问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期间，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享受到与当时世界政治形势大相径庭的，极大的温暖与关怀。

我亲爱的同行们，每当这来到莫斯科，我就会想起这个国家的作家们的作品中很多令人难忘的描写。让我用普希金 (Pushkin) 的一句诗来做代表，他曾经这样描写这座城市：“莫斯科……有多少旋律溶进那颗心，俄罗斯人的心！它赋予人们无比富饶的宝藏。”

当然我们也记得俄罗斯和苏联作家的小说、戏剧和抒情诗，他们中很多人享誉世界。他们的作品以绘画式的、深沉的风格刻画这个国家，刻画生活中每个阶层的人民，以及永远感染我的俄罗斯灵魂——这是一种概念，它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讲具有极其特殊的含义。因为没有其他国家的人民能这么乐意谈论它的灵魂。这并不意味着渴望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只是随着感觉器官去描写。这个感觉能够兼收并蓄地处理狂欢与失望、喜与忧、善与恶。就这层意义，我总是不可避免地想到我喜爱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yevsky)。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 (Belinsky) 一次说他“能让读者欢乐，同时又深深地牵动着他们的心灵，甚至让读者伴随着泪水而微笑”。

自然，这里不禁使人想到托尔斯泰 (Tolstoy) 对他的人民和祖国极妙的描写。通过他那举世闻名的小说，他将他的人民和祖国无比感人地展示给我们。当然还有普希金的作品，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性格中最好的方面概括地奉献给我们：她对自由的热爱、她的爱国主义、她的仁慈、对生活有坚定信念的乐观主义以及她那对美好事物的憧憬。

这个国家的文学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看到这样的角色，他们紧紧地依附于他们生活中的痛苦，同样也依附于生活中的喜悦。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这个含义说：“人有时会觉得以其特有的，几乎是狂热的方式依附于他的苦难。”

甚至最有生气的角色也必定显示角色的一种特色。对此，托尔斯泰如是描述：我用全国心灵的力量爱恋着“我这位故事中的主人公，我试图描绘他所有的美。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美丽的，他就是真理”。

终于，考虑到欧洲结构多方面起了深刻的变化，使得苏联在过去几年里的外交政策做了很多调整，在很多领域进行了更紧密的合作，这使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青

春》里的一段话，已经包含着欧洲特色的概念：“俄罗斯人之爱欧洲，犹如爱俄罗斯。欧洲的一石一木都是可爱的，欧洲犹如俄罗斯，也是我们的故土。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文化领域。”

“图书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本届大会的主题，这个主题是根据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安排的。

上次我们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一直强调全世界的图书馆应该努力为所有的读者提供最好的机会，使他们得到各类信息以获得知识，并以这种方式获取他国的（包括前辈的）智慧、经验和文化来认识他们自己。乔治·卢斯·博格斯（Jorge Luis Borges）曾经说过：由于图书馆拥有“由文化构成的各种事物的世界，书籍就是这个世界，它能把我们固有的和外国的文化介绍给我们。”因为“文化是用来认识世界上以往曾经说过、想过的最美好东西的”。（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然而，仅是提高本国的文化还不够，还需要——这是决定性的因素——有国际间的文化对话，以便在冲突中求得平衡，尤其处于我们今天的时代。所以很多国家的负责部门不倦地强调，要把文化政策置于首要的地位。我们清醒地考虑到各国的经济和现代的通讯联络技术的相互配合，使得世界势必日趋变小，所以促进国际文化合作至关重要。不过文化上的谅解在我们这个新的星座里必须形成一个重要的因素。自然，文化上的谅解需要高度的开放与宽容，还要由国家保证有文化创作和促进文化的个人自由的环境。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那些从印刷媒介：图书馆来了解文化的人。就这个含义，甚至可以稍作夸张地讲：“书籍使文化得以生存，其重要性不亚于机体的生存赖之于水。”那些对促进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伟大作家，他们的成功之路哪些不是靠作为知识宝库的图书馆所铺就的呢？

不过在目前这个领域需要有良好的管理。对此，我的意思是旨在形成对当前与未来有关艺术内容或文化目标进行计划周密的、公开的、适应经济的活动，其结果是服务于一般公众。在这个框架里我们的目的还必须是注意将阅览和提供信息视为文化活动，以信息文化意识去安排并让人们得到广泛的信息。作为中间媒介，图书馆的任务是能够为不同的领域提供广泛的信息，并保证向不同要求与需要的读者提供信息服务。

可以得出结论，要进入本国和外国文化的广阔大门是离不开图书馆的，它们作为文化柱石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图书馆在目前与未来的特殊作用已经在《IFLA 长期方针》中得到特别强调。这项方针是按我的设想，在昨天的委员会上予以采纳。

《IFLA 长期方针》讨论了图书馆的一般作用、对文献检索与信息利用的改进、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以及通过打好基础和继续教育提高图书馆员的专业水平等问题。下面是关于图书馆的文化、教育以及社会作用：“图书馆与文化以及教育部门一样对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提高读写能力的媒介……图书馆被认为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记录，总的来说，图书馆是教育与文化机构……图书馆作为信息和文化中心的职能要与以往传统的图书馆活动，象为公众组织展览、会议、舞会等等有所区别。”我认为上述内容要着重强调图书馆在促进文化方面的主要贡献。

亲爱的同行们，这次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标志着我担任 IFLA 主席的任期的结束。这六年任期是由 1985 年的芝加哥会议开始的，历经东京、布赖顿、悉尼、巴黎和斯德哥尔摩的 IFLA 各次会议。

我不想对这六个颇有成果的年头提出一个详细的资产清单来说明我在芝加哥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目标完成到什么程度。

由于我们 IFLA 的工作主要不是靠个别目标完成情况去评定，而是不断集中于全球性的目标，即在良好的先决条件下给各国人民提供信息的工作做的如何。这是一项长期的、大概是永无尽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寻求新的途径。因此我完全同意伯托尔特·布雷赫特 (Bertolt Brecht) 的说法：“进步并不意味已经取得了进步，而是意味正在进步之中。”

不过还是让我简短地，不求全面地小结一下在重大的政治变动期间的一些事件，它们不仅对我们的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也给我们提出无数的挑战。

现在 IFLA 的会员已经发展到 132 个国家的协会和公共机构。这个新的世界性的发展结果，使人们对国际图书馆工作的兴趣有所增长。我们协会的成员增加了，许多国家的决策人对我们工作的承认得到扩展。这一点可以在所做的生机勃勃的各项工作中，在持续增长的交往中，在访问很多国家与最高级的国家部门的磋商中以及在大会、研讨会上与我们同行们的交谈过程中看出来。

这里我不愿隐瞒一件使我忧虑的事，即经济困境，在一些国家甚至日趋严重，这对那里的图书馆起着消极的影响。加之，在某些国家文盲也在增加，所以要关心第三世界国家，这是我所特别关注的事，去年我们开始一项题为《发展第三世界图书馆事业》(ALP) 的规划。我们希望这项规划能使这些地区的情况有所改进。迄今为止，我们收到很多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具有实用性的计划，很令人鼓舞。我们非常希望能为短期和中期计划筹集必要的财政资金，以供完成必要工作所需。

就其它四项核心计划而言，则有经过充分检验的老项目“世界书目控制与国际机读目录”(UBCIM) 及“出版物国际共享”(UAP) 在持续有效地进行着。同时在我任期内着手的新项目“出版物的保存”(PAC) 和“世界数据流与远程通信”(UDT)，以及有关的同等紧迫的国际问题也在顺利进行之中。不过这里我们感觉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窘迫的财政情况，未能对那些有成效的规划实际所需予以支持。尽管 1987 年公共机构会员的会费以及 1989 年协会会员的会费收入有所增加，财政窘迫情况仍在继续。

在这方面有一项受欢迎的补充，即《IFLA 罗伯特·沃斯珀国际图联会员计划》，该计划得到图书馆资源委员会的支持，不仅对那些在核心计划的研究工作中年轻有为的图书馆员进行帮助，还为他们将来在我们全球性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做准备。

我要特别提一下，一些部、组、协商会议及一些业务组完成了卓有成效的志愿工作。由于结构性变化而提供与核心计划有关的活动领域更为密切的交叉关系，其目的是：针对我们时代的挑战，有效地完成广泛领域里的工作，并以此为指导来使用人力与财力资源。

事实上，出版物的庞大规划极适于我们的工作实际。这里还要提到 IFLA 秘书处里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所完成的出色工作。

在信息的广阔领域里，IFLA 还依靠与其他有关的国际机构和协会的良好合作。

我首先要提到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密切而可以信赖的合作，这已经大有成果，尤其对第三世界国家。这项有广阔基础的工作还接受许多其他赞助单位的支持，如 CIDA (加拿大国际开发代理处)、CLR (图书馆资源委员会)、DFG (德国研究学会)、DSE (德国国际开发基金会)、IDRC (国际开发研究中心)、马蒂努斯·尼乔夫国际基金会、NCLIS (图书馆学、情报学全国委员会)、SIDA (瑞典国际开发署) 以及威尔逊基金会，以上提到的仅

是一小部分。

与 FID 和 ICA 的合作特别令人满意，非常友好。我们彼此对有关活动互通信息，提出重要的方案，并且组织联合研讨会。

最后我还要借此机会强调，我们的全部工作要着眼于在我们的会员国内保证维护全球人权宣言：“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参加社会文化活动，享受人文学科的成果，并分享科学进步带来的福荫”。我们在《长期规划文件》中特别提到了宣言这件事，可以看到我们对宣言重要性的认识。

最后一件事：在我担任主席职务期间，使我非常高兴，并经常深深打动我的是我们能够彼此谅解、真诚一致，以及在我访问过的国家里一些图书馆讨论到它们极其困难的令人不安的处境时所表现出的乐观、严肃认真及忧虑。感谢我们在观点上的广泛一致、采取措施及时、互相支持、不同国家同行之间友好的人际关系，尤其当其他国家的书籍摆在我们图书馆的书架上，恰似“印在纸上的博爱”，这对我们相互了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想我可以说，我们图书馆员能够在目前远非谦让相处的国家之间为增进谅解做出贡献。

我将我的希望寄托于梦想之中，就如同当现实难以实现时，小说里经常写的那样。即，在一座有很多房门的，大家一起居住的宅院，世界各国人民都可以平等地、恰合身份地住进去。这里房间永远敞开，自由、人的尊严、机会均等、互相尊重、理解与支持是天经地义的。

当然，这里的每间屋里都必定有大量的藏书和媒介资料，并备有供交流的通讯设施。

有朝一日至少将接近这个愉快的境界，让我们大家今天和将来都为这个目标而工作。

吴澎鹏 译

葛 凌 校

图书馆与文化

(苏联) N. N. 古本科

我相信,今天召开的 IFLA 会议能反映这样一个概念:将文化视为一个集成的整体,视为体现知识、道德与美学诸方面相统一的工具。

文化和历史遗产经过千百年的历程已将世界上许多国家团结起来,成为保存文明完整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图书馆就是这个遗产的一个纽带。

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曾经写道:“是的,我的摇篮在图书馆里。”也可以说,整个现代文化的摇篮在图书馆里。很难搞清图书馆出现以前,有多少辉煌思想和发现被湮没。至少有三次由不同国家的人重复发明纸、指南针、瓷器。几个世纪以后,地理和天文方面又重复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周而复始的劳动,直至有了图书馆才告结束。图书馆自此担负起这一特殊使命,收集和传播得自空间与时间的知识。

在我们千变万化的时代里,图书馆保存着从古至今永恒结构的文化,得以保证思想的延续和历史经验的积累。

尤为重要的是,图书馆馆藏反映所有国家的成就,它比任何理论更有说服力地证明人类在文化空间里的团结。这意味着图书馆是对民族狭隘心理、种族野心和闭关自守意识的最好批驳。

我们确信,无论排外心理何等强烈,在我们的国家里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不容忍是有害的和没有前途的。各种文化结构的相互影响只有在国家和国际之间才能产生。

苏联文化部已制定出苏联主权共和国关系新准则,即权利均等与互利。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从预算内给全联盟文化和艺术发展基金会拨款。该基金会向全国重要的重点计划提供经费,包括为切尔诺贝利事故地区居民提供文化服务,开展少数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保全所有联盟共和国的著名文化遗址,拟定病残人心理康复计划等。

图书馆的问题也将在这些计划中予以解决。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的火灾是一场全球性的文化灾难。国内很多图书馆都参加了消除其后果的工作。收集了成千上万受损的出版物复本,并正在建立一个大型的入藏著作修补与保存中心。IFLA 领导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专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图书馆界、文化界人士对挽救受灾馆藏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这是令人难忘的国际团结的范例。知识和物质资源的交流不仅在个别情况下,而且对于解决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问题也是需要的。例如,文化商品化的发展导致很多消极后果:由于负担不起开支费,图书馆网络正在减少;图书馆不断地引进有偿服务,不断地砍掉那些从前免费提供的传统服务。与此同时,市场经济规律刺激腐蚀性的虚假文化的泛滥,而真正有美学和精神价值的文化却被埋没。我想这些问题需要共同来解决。

目前文化工作者最关注的不是赞誉,而是文化商品化和私有化可能带来的危险。从前我们安慰自己说,我们虽穷但精神上富有。这似乎难以理解,但是文化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可能导致物质上富有而精神上贫乏的情况。

旨在大规模削减教育与文化方面预算的节约经费规划将是一种重大的失策。

削减拨给文化事业的经费，将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对新的民主社会的希望产生质疑。即使是现在 1991 年度财政拨款的增长，也需要我们在各方面做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和斗争，况且，生活费用的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建筑重建、维修工作的大量开支，已使这些增长化为乌有。

在目前条件下，关心文化对国家来讲确实是件极其困难的工作。我认为免征图书馆的土地税、房产税还是合理的。不过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全联盟，各共和国和城市当局理解文化，尤其要理解图书馆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在预算内进行无痛苦再分配，不应该存在任何障碍。这主要是靠裁减军费，它将使文化预算的规模提高到可以被接受的水平。

一体化，尤其是欧洲文化的一体化问题，在今天甚为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被匈牙利、波兰等一些国家所超过。一体化进程并不仅限于建立文化纽带或接受援助，而是意味着在现实条件下有机地纳入一个崭新的组织结构。在这点上，图书馆之间的协作活动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大家的通力合作，图书馆的价值就不可能得到维护与恢复。这项任务费用极大。凡是被视为遗产的都要保存，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还要为重新制定新的预算拿出更大的勇气，这才是国家对图书馆服务理所当然的政策。偏离这个政策，就会使我们对国家的精神复兴丧失希望。

许多图书馆员、教师都对儿童和青少年逐渐丢掉读书习惯而感到吃惊。这些孩子被视听设备和电子游戏机搞得昏头昏脑，导致头脑简单，反应迟钝、这为操纵人们的意识打下了基础。

此前，苏联与其他东欧国家尚未认识到这类问题。这并非偶然，演员兼制片人彼德·乌斯蒂诺夫（Peter Ustinov）在接受意大利《Rinascita》周报采访时表示，希望东欧各国能够保持他们有积极性的成果。例如，他呼吁关心儿童成长期的教育，指出在苏联凡居住 500 名以上儿童的地方，孩子们就有他们自己的剧场、俱乐部、少先队之家或儿童图书馆。他大大地夸张了剧场的数目（我们的剧场很少）。但就图书馆而言，其数目确实可观，大约有 326000 所。

我们能够引以自豪的事实是，苏联每个居民区均拥有一所图书馆。然而，确切地讲，我们实在难以保持这一优势。我们庞大的图书馆网络为了维修和采购馆藏花费了巨额资金。主题出版物严重不足，因而馆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执行了几十年的、为文化事业提供资金的残余原则也起着消极作用。由于这些原因，这个国家很多主要图书馆，包括列宁国家图书馆均处困境。1990 年，为了重建列宁国家图书馆和利用我们国家图书馆已经开拓的巨大宝藏，政府拨给了相当上千万硬通货的卢布作为经费。

同时，必须利用国外有效的经验，组织服务和图书馆信息技术的现代手段，重建国家图书馆体系。

苏联专家提出了一个发展图书馆服务的新概念，这些想法将在进一步的交流中实施，并像我们所希望的，在这个有威信的论坛上大大地充实起来。

有必要论及另一个有关时事的问题：图书馆与民主。寂静迷宫般的书库和阅览室是思

想斗争、大胆探索真理的场所，它们记载着哲学和政治观点无止境的分歧，讲授着思想自由。任何独裁和极权主义政权都对图书馆馆藏内容进行极其严格的控制，这决非偶然。遗憾的是苏联图书馆也经历过这种思想意识审查制度。1985年，我们的社会开始了新生，解除了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对自由接受出版物的一切限制。保证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在苏联已经生效。目前已制定出文化和图书馆服务立法条例草案，这些条款是整个文化机构和图书馆工作，包括人类自由选择 and 接受信息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民主立法的保证。

民主社会是信息灵通的社会。无疑，图书馆在给国家居民提供所需信息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不仅是民主立法，而且图书馆自身管理的发展也应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保证。应该强调的是，苏联的图书馆员没有等待立法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自主地在专业协会和学会中组织起来。这个国家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地区的图书馆协会、全俄联盟图书馆学会、共和国协会、全联盟科学技术贸易联合图书馆协会等。这些协会与产生的联合会一起实际上参与制定我们的文化政策。

就我所知，IFLA 的国际规划完全依赖于所有图书馆员和他们的专业协会的积极进取精神。在这些问题中，人们会提到世界书目档案、保存印刷文化纪念品规划等等。既然 IFLA 的路线有助于将各国图书馆网络组成世界图书馆情报服务体系，加速全人类文化的进步，从而促进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更高尚、更民主的世界秩序，我们当然要积极参加这些图书馆规划。

本国公众生活的迅速变化，已经使政策转向不能剥夺公众对文化场所的要求。电视播放的极其奢靡的电视片和主角引起了公众的议论。然而，博物馆和图书馆的使命是使我们的热情更加高尚、更富于人性，将自我毁灭的力量转变为永恒的、自我振兴的力量。

我们的国家因为自由而欣喜异常。人们被怨恨、希望、盘算、计划和各种思想搞得不知所措，它们预示着慢性政治酒精中毒的恶兆。培利斯托伊卡消除了文化对意识形态的依附，却没有消除其对财政的依附。被某些人的代表议员称为“自筹资金”的原则只能淡化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概念。这个原则大不了会使文化落入商品化和表面效益的陷阱，这等于在“艺术为人民”和群众文化口号伪装下的自我毁灭。这种艺术和文化必须自筹资金的极端思想实在令人吃惊。国家应该认识到，文化是各国的主要道德支柱。文化是个轨迹，据此我们能够找到我们人民过去所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遵循它，我们能够奔向未来。

那些想给文化投入最少资金的人应该懂得，当暂时的经济效益变得高于道德和文化标准时，他们就改变了道德标准，使其超过了客观现实的界限。漠视文化是荒谬的，它可以淹没任何权威的威望。这一点应该为那些必须而且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所理解。

(叶明芬 译 葛凌 校)

国家图书馆的战略计划

(英国) 莫里斯·B·莱因

引言

目前,许多图书馆都越来越注重制定战略计划。一些文章和书籍纷纷探讨制定图书馆战略计划的必要性及其优点、作用和效果,其中最新的当属雅各布著的内容详细的手册。国家图书馆与一般图书馆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这在制定国家图书馆战略计划时应该充分考虑。

笔者曾经为几所图书馆和私营信息公司制定过战略计划,其中包括三个国家图书馆。我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之间的差别使国家图书馆更需要制定战略计划,而且也更加困难。

国家图书馆与一般图书馆在制定计划时存在哪些差异?

首先,国家图书馆较其它图书馆更直接地听命于政府;尽管它与相应政府部门之间往往设有诸如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但很少有真正的自主权。这便造成几种后果。

第一是政府政策的变化,特别是政府的更迭,会立刻直接地影响它的国家图书馆。例如,一个政府推行私有化政策,那么它几乎肯定要向国家图书馆提出一些根本性问题,如它的哪些活动有助于实行私有化?或者,靠政府拨款的国家图书馆可能不得不迫于压力而多挣钱以维持生计,这既是出于政策的考虑,也是为了减少政府的开支。特别注意政治色彩的政府现在也都讲经济效益,它们不仅要了解钱用在哪里,而且要知道怎么个花法,以及该花不该花。此外,国家图书馆的资金突然遭到大幅度削减也是时有发生的事。更糟糕的是,经费可能年年变,令人难以预料。其中任何一种压力都会突如其来地落到图书馆的头上,严重地影响它的指导思想;如果所有这些压力同时出现(这决不是不可能的),其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国家图书馆与其它图书馆的第二个,也是基本的差异是,前者没有规定明确的读者对象。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说,公共图书馆也没有明确的读者对象,但是,公共图书馆实际确有明确的读者对象,只是范围很宽——即本地整个社区——但需根据其轻重缓急不同对待。而国家图书馆的服务范围可能是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范围的,因为它们要向全世界的学者提供服务。国家图书馆不仅需要确定为谁服务,因为它明摆着无力为每个人服务,而且,国家图书馆没有法定的义务需向某一群体提供服务,这意味着,除了政府,没有人能够帮助确定图书馆的服务对象。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自主权,但更可能是一种负担;比如,在捉摸不定的条件下工作不会令人愉快,如果国家图书馆的经费削减了,一般来说不会引起大惊小怪,可是一旦院校图书馆的经费被削减就会招来非议。

第三，国家图书馆通常负有其他图书馆所没有的对外往来和国际职责。它可能很需要或者希望与其它的国家图书馆数据库实行联网，因此，它们之间无论如何要保持经常的密切联系。它们不能忽视国际标准随意地自行其事。

第四，国家图书馆不能（当然也不应该）闭关自守；它是本国图书馆及信息整体系统的一部分，它的职能和运作方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它图书馆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决定的（反之亦然）。我曾在两年前写的一份报告指出，某一种全国性的图书馆或者信息职能不可能完全由国家图书馆承担；在某些国家里，每一项这种职能则是由其它图书馆或私营信息机构联合承担。别的机构已经干得好好的工作不必取而代之，也不必重复别处能干好的工作。国家图书馆无法脱离其它图书馆和信息机构的情况而自定计划。

此外，分散化在许多国家里已成为一种强烈的普遍趋势，部分原因是因为对中心集权机构不满情绪的增长，但主要原因是由于新技术的出现使它得以实现；资料收藏在哪里已无关紧要，因为运用通信技术能够（在原则上无论如何）使路途远近不构成问题。

最后，国家图书馆比其它任何类型图书馆都显示了范围更广的多样性。已经发表过的几个国家图书馆职能一览表，它们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都是由国家图书馆履行的职能清单，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图书馆都确定其中的部分职能加以执行。

在这样的环境中国家图书馆如何制定计划？

国家图书馆在制定计划时务必考虑到来自政府的种种压力，经费的削减，不明确的读者对象，范围广泛的职能，以及国内其它图书馆和信息工作。这确实使各国国家图书馆制定的计划存在差异；它可能让人觉得制定计划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么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下如何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非常困难”——但这并不减弱制定计划的必要性。如果国家图书馆不明确规定自己的服务对象，工作任务，完成这些工作的意义和方法，以及未来几年的工作设想，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摆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向政府申请各种经费；他们的经费更有可能因而被大幅度削减，或者派给原本不是它的工作。如果国家图书馆未确定自己的工作和奋斗目标，那么政府会替它决定的。

每一个国家图书馆都必然按照政府条文规定去做，但是，这些法规通常措词笼统，给图书馆留下相当大的回旋余地。无论如何，国家图书馆必须慎重考虑哪些工作的确涉及到它履行的职责，而职责又是多年前制定的，同时情况已发生了变化。结果可能是这个法规需要修订。

同其它类型的图书馆一样，国家图书馆以往毫无疑问地对读者及服务工作，特别是对他们的轻重缓急给予诸多考虑。不同战略计划的差异就是，准确地将所有这些考虑组织整理并记录下来。在计划的过程中，一些似乎合情合理的想法（有些很可能不合理或者脱离实际）会产生出来形成某种差异。每个经历这一过程的图书馆都发现，他们的思路更加集中了，原先的想法常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顺便提一下，我写文章时常常发现，贯通文章的过程至少会使我对自己的思想理解得更透彻，有时这种思路的逻辑推理使我得出意想不到的结论。借鉴别人的看法有助于形成并完善自己的思想。这肯定是一个经验之谈。

国家图书馆战略计划中的读者对象

由于国家图书馆在本国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与其它图书馆保持联系的必要性，它的战略计划的读者要比其它图书馆多，引起的兴趣也要广泛得多。政府是主要的读者，这就要求计划写得得法，有别于其它馆。其它馆拥有另一类读者，这就要求它出版计划，或者至少广泛地提供计划。国家图书馆本身的工作人员是第三类读者。

所有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制定国家图书馆的计划需要比通常更长的时间。如果仅此原因，图书馆应该立即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否则，政府要它提交计划，时间就仓促了，这样仓促制定出的计划不会令人满意。

国家图书馆的战略计划理所当然地要考虑政府的各项政策；计划可能需要与由政府拨款的其它机构制定的战略计划从形式和风格上保持一致。

选择与优先

任何图书馆在它的战略计划开头都应阐明它的服务对象，对国家图书馆来说，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如上所述，既然国家图书馆必须做出一些困难的选择，那么要它确定读者对象也就更加困难。例如，它的主要对象是一般公众、工业界、研究部门（要是这样，只包括人文科学界还是涉及所有学科？只对国内学术界还是面向世界？），或是别的什么读者？或者，它是否希望为所有这些对象服务？

一旦服务对象确定，就得规定向这些读者提供哪些服务项目。先了解现有服务项目，再看一下如何增加服务项目。但最好先列出所有可以提供的服务项目，包括那些与目前服务无关的项目，然后加以筛选。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会发现一些新的、比现有服务更有效的服务项目。

对采访、人员、设备及服务等方面会做出什么决定？结果如何？怎样的资金条件？如果这些情况一经确定，那么，图书馆现有的资源实际上可能不够支付它们想要开展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提出充分的理由申请增加资源，要么不得不压缩自己的计划。无论哪一种情况，都需要考虑轻重缓急，比如采用“负优先法”——如果必须压缩，应该先砍什么项目。

为效益而投资及经营计划

某些潜在的新型服务被证实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自我维持、发展，但它们需要“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一种资金的初始投入，它可在三年内收回。针对此种情况，必须制定一个经营计划，列出三年中每年支出和收入的估算。

即使不赢利，制定经营计划也不失为一项极好的培训内容；它可使工作人员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新意识来关心各项成本费用，因此，这在战略计划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战略计划的落实

战略计划不能是一成不变的；每隔二、三年就应该做一次修订，使其成为推进工作的计划。但是，如果不制定某种计划来保证计划的执行，那么战略计划最多不过是个计划，仅此而已。

因此，最好制定来年图书馆每一项工作的实施计划，明确规定图书馆应做些什么，每项工作由谁负责落实，以及预计完成的时间。与五年计划相比，这类实施计划便于检查监督。

战略计划的作用和影响——内部的和外部的

制定战略计划时应考虑到所有读者：政府部门、其它图书馆、本馆工作人员以及可能对此感兴趣的其它国家图书馆。战略计划发表后应该能听到反应（如果没有，那就令人不安了）。最起码的，它应让他人知道国家图书馆的工作和工作目标。

制定战略计划对图书馆工作人员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永久性的。在制定计划的工作中需要许多工作人员（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以小规模的方式参与，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其意义将大为降低。随着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制定计划的思想应成为图书馆及其管理的一个固定的意识。

（赵维如 译 蒋伟明 校）